



南 思 語 言 評 論

2007年09月01日

总第009期

南思翻译



目录

CONTENTS

译人译语

——从归化与异化之争谈英汉习语互译

译言堂

——以翻译为业能否谋生

名家谈

——阿翰林：针对翻译弊端的一剂良方

译界列传

——游吟在翻译与漫画之间：高莽

译意风

——26部诺奖作品翻译者竟一样

主 办：南思翻译（北京）有限公司

编辑小组：《南思语言评论》编委会

总 编：卢万里

主 编：Sam

本期编辑：Iris/June/Ruth/Fiona

发 行：Karen

投稿邮箱：nousservice@163.com

M S N：sample931@hotmail.com

will you join us

南
思



从归化与异化之争谈英汉习语互译

摘要：归化和异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翻译态度，异化的翻译在保持对原文的忠实、促进文化交流和吸收外来语词汇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翻译习语时应将两种译法并用。

传统的翻译原则是“通顺的翻译”，即“归化”（**domestication**）的翻译，其结果是译文读起来通俗易懂，不存在艰涩拗口的现象，象是原文创作的作品。在英美翻译文化中，一直以通顺翻译的归化理论占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是奈达。他提出翻译应“以读者反应为中心”。甚至还有人提出“针对不同类型的读者出版不同的译文”的观点。

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通过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对归化的翻译原则提出了质疑，并批判了以往翻译中占主导地位且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倾向，同时提出了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的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即提倡异化的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这种翻译保留了外国文本中之异，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为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近年来，以上两种翻译方法的争论日趋激烈，以习语（**Idioms**）的翻译为例，英汉两种语言都有相当数量的习语，由于风俗习惯和地理位置的不同造成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意义完全相同、结构相似、字数相等的习语很少在译文语言中找到。在跨语际翻译中，如何处理原语和译语中文化个性浓重、表达形式相差甚远的习语呢？是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还是异化翻译方法呢？对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归化的翻译谈英汉习语互译

归化的翻译在理论上是把语言看作交际工具；在实践上，强调通俗易懂，避免多义或歧义。

习惯认为，当原文与译文之间因文化差

异而出现不能通达的情况时，“要用译语文化替代原语文化”，即把在译语中找不到对等的外语词汇改头换面，或套用译语中与之相似的现成的表达法，把它们变成读者熟悉的译语文化形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

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 “三个和尚无水喝”。

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等。

这样的翻译处理，既传达了意义，译文也畅达，因此，倍受译文读者的欢迎。

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要求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文化意识，因为大凡在译语中难以全面、准确再现原语意义的情形一般都发生在原语与译语中承载丰厚文化内涵的一类词语。如汉语成语“狐假虎威”，它反映了汉民族对狐狸与老虎这两种动物特有的民族心理感受及认知，根植于汉民族文化。由于英语民族缺乏对这两种动物的上述心理体验和文化内涵，故英语就没有关于狐狸和老虎这种文化内涵对应的词语。若将之译为“**The fox is false, while the tiger is mighty**”，英文读者就会不知所云；反之，汉译英时，将其转用民族熟悉的形象“**an ass in a lion's skin**”，读者就很容易理解了。

由此看来，在缓和语言文化矛盾这一方面，归化的翻译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有效替代了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既通顺又易懂。但是，因过于强调通顺归化的翻译也暴露出它的缺



陷，一是会产生对原文语义的截流，二是会失信，有时甚至会扭曲原文含义。

以谭载喜与奈达一文中的句子“**It is as significant as a game of cricket**”为例，赞成归化的人认为该句不能译为“这件事如同板球赛一样重要”，而只能借用中文读者熟悉的形象，译为“这件事如同吃饭一样重要”，或干脆译为“这件事很重要”。后一种译法虽译出了该句子最重要、最突出的涵义，却造成了文化语义的亏损，让读者失去了欣赏英语文化色彩的机会。前一种译法虽然易懂，但是却有所“失信”，“板球赛”，与“吃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二、从异化的翻译谈英汉习语互译

尽管在英美文化中，归化的翻译占了主导地位，但19世纪初，异化的翻译在德国兴起。这以施莱尔马赫在1813年的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为标志。在英国，钮曼也主张在译文中要保留外国文本中之异，反对在英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归化的翻译。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是美国一位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翻译思想的积极创导者。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不是要“求同”而是要“存异”，反对译文通顺，提倡异化。其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比如我们前面提过的“**It is as significant as a game of cricket**”，既然采用归化的译法不妥，不如直译为“这件事同板球赛一样重要”。这样译，明显地体现了英汉两种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吃饭被认为是人们的头等大事，以至于有这样的习语“雷公不打吃饭人”，甚至人们见面的头一句问候语就是“吃过了吗？”。然而，在英国，板球是人们最热衷的运动，板球赛是男女老少都关注的事，因此，有以上那个例句是很自然的了。用异化的方法把它汉译过来，既忠实了该句的原意，又能巧妙地把英国文化

介绍到中国来，让广大读者了解英国文化背景。这样处理，显然弥补了归化翻译的不足。

为了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含有典故的习语也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穷棒子闹翻身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周立波《暴风骤雨》）若既能让英语读者看懂，又能让英语读者了解“八仙过海”这个动人的中国神话故事，则是翻译工作者求之不得的事。因此，该句可译为“**The way we poor folks try to emancipate ourselves, is just like the way the Eight Fairies crossed the sea each displaying his own talent.**”把“八仙过海”直译成英语，还要介绍一下“八仙”是中国神话故事的人物，以便让英语读者理解。所以加注：

“**The eight immortals of Taoism in Chinese folklore.**”

三、异化的翻译、文化交流与吸收外来语的关系

翻译负有文化交流的使命，即尽可能把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介绍给另一个民族。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译文要“保留原文的丰姿”。在南京大学姜秋霞教授举办的一次翻译调查中，多数读者认为，读异国文学是为了欣赏异国作品特有的韵味和语言风格，他们在读译文之前就已经对不同文化的差异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有些人读译文的目的是想了解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异同究竟在什么地方。因此，从促进世界文化交流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在处理英译汉或汉译英时，都应着力于全面、完整地向译语读者介绍对方（己方）的全部意蕴，包括文化。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汉译英中，我们尤其要树立这种文化意识，积极创造条件，弘扬中华文化，帮助英语读者扩大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异化的翻译无疑在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任何一种语言单凭自己内部的发展是不够的，若想有更强的生命力，必须吸收外



国语的表达方式和外国文化以丰富自己。就以英语为例，它是世界上吸收外来词语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语言。除流传地域广泛外，它还包容了其它民族语言的表达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达力，因此能够成为当今运用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

语言。多年来，随着外国语言、外国文化的介入，汉语里也增添了不少外来习语，如“to break the record”（打破记录），“packed like sardines”（挤得象罐头沙丁鱼），“sour grapes”（酸葡萄），“the cold war”（冷战）等，大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异化的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有助于吸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丰富祖国语言。

异化的翻译并非十全十美。它虽忠于原文，但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使用这种方法译出的文字甚至有时难免显得不通顺甚至晦涩难懂，如在科普文章和影视剧中，异化的翻译并不适合，因为这类作品的翻译主要是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

四、在英汉习语互译中解决两种翻译缺陷的尝试

不同的译文由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对象以及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也应当不同。我们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地排除任何一种译法，而应根据不同情况恰当地选用某一种译法，或将两种译法综合运用，才能取长补短，克服归化、异化两种翻译方法各自的缺陷，使译文尽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大可不必”。句中的“红白喜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风俗习惯，与西方国家习惯大不相同。西方人结婚新娘子大都要穿白色婚纱；而参加葬礼时，人们都要穿黑色丧服。有人担心直译出来，英语读者接受不了，但原句已对“红白喜事”，作了解释，即“讨媳妇，死了人”于是我们可以放心地采用异化的方法将它译成

“When people wear red or white, that is at weddings or funerals, the practice of giving lavish feasts can well be dispensed with”。这样既不必担心读者接受不了，又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再如“He doesn't stand a China man's chance of winning this election.”为什么这句英文要说“中国人”呢？这是因为19世纪中叶，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于是大家一窝蜂似地西去淘金，那些白人淘金过后所剩下来的渣滓，已无人过问了，才轮到当地的华工拼命去加以淘滤，他们能淘到的黄金，真是微乎其微，所以白人就把这个叫作“中国人的机会”。这个成语除表示没有机会外，还暗讽中国人过去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一切落在人后，它明显含有民族歧视的意思。若把它译给现在的中国人看，就不能直译成“中国人的机会”，这恐怕会引发民族仇视。为了避讳，最好归化地译为“他在这次选举中没有当选的希望”。况且，这是纯粹的美国话，在其它说英语的国家是不大通行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通顺的翻译在本国文化中传播外国文化是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但是，随着各国间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本国文化对异国文化越来越采取宽容的态度，异化的翻译也慢慢为读者所接受，并开始领导新潮流。语言中的习语翻译也是这样，从归化到异化，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最终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对象以及语言的环境。由于归化的翻译和异化的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不能互相替代的作用由于归化的翻译和异化的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不能互相替代的作用，因此，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相互补充。

（作者：谭晓丽）



以翻译为业能否谋生

前一阵见到几篇讨论翻译稿酬的文章，本想参加一些意见，因事忙，放下了。现在那些文章不在手头，只能凭印象。记得施康强先生和另一位长年从事翻译的老先生认为翻译稿酬与付出的劳动不相称，单凭稿酬是不能养活自己的。而另一位年轻人则表示自己日译8千字，算起来，月收入相当可观。根据我业余翻译的经验，这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都有道理。

我非翻译界人士，但凭对这一行业现状的粗浅了解，可以说，在“性价比”（姑且借用商品词汇）上倒挂现象相当严重。日译8千字，完全可以，甚至更多，那要看原稿是什么内容，译文要求如何。多年前，我有一位老同学是退休工程师，他告诉我，正在承接一些工程方面的翻译，多为进口设备的说明书，稿酬不菲。最有意

单调无味。我更珍惜自己的时间，偶做翻译，只为自己感兴趣，认为值得翻的，而且文字对我有挑战性，译作过程有满足感、成就感。所以此类事一概婉拒。那是因为我并不以此谋生。否则，既省事又赚钱，何乐而不为？

另一类翻译就是另一回事了。以施康强先生为例，他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法文、中文造诣很深，译过多部名著。还记得几年以前十几个《红与黑》的名家译本擂台赛的盛事。《文汇读书周报》组织讨论文章，名家各抒己见，郁郁乎文哉！此类翻译是译者调动自己的中外文修养和文化底蕴，字斟句酌而成。如严复云：“一名之立，踟躅旬月”。一天能译的字数如何计算？又如杨绛先生译《堂吉珂德》，先学西班牙文，然后译出，十年磨一剑。此中心血劳动如何以稿酬计？

●消费品中真正的“精品”可以在豪华商店中标极高的价格，自有“大款”买；而十年乃至终身磨一剑的译作，能以与投入相称的高价出售，然后回报译者吗？毋庸赘言，这一情况不仅翻译为然，当然也适用于原创的学术著作。

思的是，每一个字都算在稿酬字数内，例如：1号螺丝母3枚，2号螺丝母4枚……而一套设备重复的零件甚多，还有，每隔几页就有类似“专利所有，仿造必究”的字样，重复多少遍，就算多少字。我听来简直不可思议，那位同学也觉得这个活儿轻松又上算。像这样的翻译，日译万字不在话下。不过并非每天每月都能不间断地揽到这样的“活儿”，所以，他如果没有固定的退休金是否能以此谋生，不得而知。

以上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普通一点的，本人就曾接到某些机构询问，是否愿意帮助翻译一些资料，稿酬超出一般出版社的标准好几倍，而内容比较简单，用电脑代笔，日译8千字未尝不可。但是内容

本人也译过一些文学名著。例如巴尔扎克的作品。粗读并不困难（许多形容词可以跳过去，或猜个差不多），翻译起来却非常费劲。一则因为巴尔扎克的特点是过细的写实描述，每个人物出场从长相、身材到衣帽服饰都一一细说，单是衣服面料的名称就足够查半天词典的。而往往衣饰与人物性格、地位都有关联，不得马虎。记得见到过傅雷先生自称他译一篇巴氏著作要查上千个字，心中稍平，他尚且如此，我只有抱着字典啃。另一难处是典故特别多，对欧洲，特别是法国历史不熟悉，望文生义，就要闹笑话。更要命的是此翁常常把真人真事与他自编的《人间戏剧》中的人物情节混在一起，因为他的人物都写

活了，硬要读者当作真人。这又需要译者对巴氏其他著作有所了解。至于双关语、俏皮话，更是令人头痛。所以注解是不能省的。译文成稿后，自己看过多遍，每看一遍都发现错误或修辞欠妥。平均每天译多少字，其中查阅文献花多少时间，没有计算过。总之，以当时的稿酬标准，以此谋生是绝对不行的。

除文学翻译外，还有学术著作。往往好的译作与专业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译作，又如前几年出版的苗力田先生主持的从希腊原文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等等，都需要专业研究很深的学养，非一般人可做，所费时日，又岂止十年磨一剑？对此类著作，出版社付多少稿酬？据我所知，有时因为此类书市场小，甚至需要倒付出版补贴才能出。大约十年前，毕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梁志学与沈真夫妇，从德文原文译《德国古典哲学概论》，出版社还要译者自己包销数百本，令人不胜慨叹！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一些当红的洋人的学术著作，出版社为了赶时髦、赶时间，根本不顾翻译质量，因为作者有名，自有追星买主，读不读是另一回事。此类书的译文就像码在那里的一堆新名词，不知所云，无法卒读。据知情人告，现在有些翻译著作已经是电脑软件译的。方法是：第一遍先让电脑操作(恕我无法说明如何操作，因为我没有用过)，出来的中文当然错误连篇，然后“译者”再捋一遍，改成可以读得通的文本。这样的速度岂止日译8千字！稿酬呢，以千字计，也不会低于高级文学和专业翻译，如果是市场效应好的，以版税计，那就更加优厚了。此风滥行，据说现在有些约稿方专门规定不接受电脑译稿云。

所以，靠翻译是否可以谋生？答案是：粗制滥造者可以，越是精品越难生存。这也许与方今假冒伪劣商品乃至有害食品之所以屡禁不绝有类似之处，盖因合格产品成本高而利润小，而消费者又欠“挑剔”，

容易上当。但是又有所不同：物质的假冒伪劣产品毕竟有专门部门管，至少还经常有人关注，经常在“打”；而欺世盗名的译作却无专门部门管，偶有认真的读者写文章指出，却呼声极弱，大多无下文。另外，消费品中真正的“精品”可以在豪华商店中标极高的价格，自有“大款”买；而十年乃至终身磨一剑的译作，能以与投入相称的高价出售，然后回报译者吗？毋庸赘言，这一情况不仅翻译为然，当然也适用于原创的学术著作。

行文至此，想起曾翻阅《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手迹》，见到1931年夏丐尊函，称蒋光慈愿意为中华书局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开价千字5元，还说明“不除空行及标点”。王力先生1930年留学法国期间函，表示愿将所译法国戏剧几种稿件售予中华书局，开价是千字4元，并要求预先一次付清，以支付留学生活费用。1937年，王力又致函中华书局，愿将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论文集结出版，提出版税是15%。关于那个时候的生活指数与今日之比，陈明远先生对此有详细研究，我的印象根据他的算法大约是1:40。那么不必日译8千，8百字就足够生活得不错了。一名留学生就可以用文学译作在国内得的稿酬补在巴黎的生活费；大学教师的专业学术论文集可以要15%的版税，大约今之译者、学者只能望洋兴叹了。

作者：资中筠

资中筠：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翻译家。著有《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斗室中的天下》等。

●靠翻译是否可以谋生？

答案是：粗制滥造者可以，越是精品越难生存。

——译言堂



南思翻译依托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深厚背景，通过整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交学院等知名语言学府的优良资源，并广泛与各行业的专业语言人才及众多优秀外籍人士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南思翻译已积聚了一批处于业内领先水准的语言人才，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思翻译视质量为生命，企业创立之初即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丰田、日立、大隈、荏原、武田、松下、东软、新浪、马自达、普华永道、清华紫光、用友、Adobe、SONY、Canon、NEC、SONIM等国际知名企业始终是南思翻译的座上宾，深得客户信赖。

阿翰林：针对翻译弊端的一剂良方

苏联科学院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开创了俄罗斯汉学的阿列克谢耶夫学派，被公认为汉学研究的权威，郭沫若称他为阿翰林。他不仅从事汉学研究，也擅长文学翻译，《聊斋志异》、《中国古典散文选粹》、《常道集——唐诗选》等，可以说是他的译著代表作。他终生从事文学翻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深知翻译的艰辛，对于翻译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也了如指掌。

在阿翰林的家庭档案里保存了几页草稿，那是翻译家针对翻译弊端所写的论文提纲，就像一位高明的医生为患者开出的病历，逐项列举了当时俄罗斯译者常犯的通病。阿翰林为译者开列的这份诊断书，距今已有七八十年，但仍不失其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透过这份提纲，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阿列克谢耶夫如何为翻译作准备工作，如何尽力避免各种误读误译；同时他也在告诫他的学生尽量避免类似的错误。1929年草拟这份提纲时，阿翰林写道：“我把这份‘提要’尽力写得完整，心想，对于专门从事翻译事业的人们来说，这些‘琐碎的细节’同样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一 通病诸种

1. 不动脑筋；
2. 不假思索地胡说；
3. 堆砌辞藻；
4. 不懂装懂；
5. 不查明情况；
6. 不准确；
7. 遗漏；
8. 自作主张随意增删；
9. 粗心大意；
10. 笔误（笔迹难以辨认）。

二 方块字

1. 记不住汉字笔画；
2. 读音错误。

三 知识准备不足

1. 欠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2. 对孔夫子的儒家学说缺乏了解；
3. 对道家缺乏了解；
4. 对佛学知识缺乏了解；
5. 对生活缺乏了解；
6. 同样，对官职称谓尤其缺乏了解；
7. 对特殊的姓名感到困惑；
8. 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
9. 同样，缺乏文学史的基本知识；
10. 不明白文学的特殊性；
11. 不懂版本学和术语学；
12. 不知道研究课题的各种术语；
13. 一般说来对文本涉及的事物缺乏了解；
14. 异国风情；
15. 推论（基于大致情况的推断——李福清注）与倾向。

四 技能准备不足

1. 达不到作者的水平；
2. 对作者的创作个性缺乏了解；
3. 对文本一知半解；
4. 过分强调俄罗斯化；
5. 生搬硬译；
6. 丧失原作文笔的巧妙之处。

五 词典使用

1. 查词典不仔细；
2. 抽奖一样碰运气（可能指随心所欲选择词义？——李福清注）；
3. 迷信词典：奴隶式地拜倒在词典面前等等；
4. 逐词逐句照搬词典等；
5. 不懂外国词语；
6. 不会翻译诗歌；
7. 选词不当。

六 遣词造句

1. 不了解节奏；
2. 同样不了解对偶、对仗；
3. 同样不了解对比、反衬；
4. 标点符号使用不当。

七 结构

1. 不具备起码的语法知识；
2. 结构往往被破坏；
3. 对虚词（辅助性词类——李福清注）同样缺乏基础知识；
4. 同样不会使用虚词；
5. 把字当成词；
6. 不懂插入句。

八 上下文

1. 上下文被破坏；
2. 编造，不认识主语；
3. 佯作曲折；
4. 从属句的处理。

九 语言混杂

1. 口语跟文学语言的混杂；
2. 自己人的名字进入文本。

十 懒于查询

1. 不了解参考书目；
2. 不了解引文等等。

十一 非学术性

1. 达不到当代学术水平；
2. 违背历史的诠释；
3. 文本印刷恶劣；
4. 引出违背学术性的严重后果。”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指出，提纲当中有重复之处，那是作者有意识这样写的。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汉学家李福清亲眼见过这份提纲，并对其中某些疑难之处进行了注释。他深有感触地说：“阿列克谢耶夫列举了拙劣翻译的所有弊病，没有说的大概只有一点，那就是翻译家必须掌握自己的母语——俄语……阿列克谢耶夫翻译蒲松龄小说，凭借闪光的、讲究艺术技巧的语言，凭借翻

译文本与众不同的风格，使得译著不断再版，成了俄罗斯文学当中的经典，屹立在俄罗斯文学经典之列，获得了即便不能说是永恒的，那也是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所有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应当认真读一读阿翰林草拟的这份提纲，记住他的谆谆告诫，切莫把文学翻译当儿戏，以为“会外语的人都可以搞翻译”。

文章来源：2007年4月18日 中华读书报



名家談

译界列传



高莽（1926—）哈尔滨人，20世纪俄语诗歌翻译名家、著名漫画家、首译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曾任《世界文学》主编，致力于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艺术六十余年，在青年时代就曾经翻译过俄罗斯著名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后来又翻译过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玛雅科夫斯基的《臭虫》等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文人剪影》、《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圣山行——寻找诗人普希金的足迹》，准备出版的有《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等。

高莽的笔名众多，不过“乌兰汗”这个名字却称得上大名鼎鼎。记得第一次读到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人与事》时，译笔的美丽让人惊讶，后来才知道译者“乌兰汗”就是高先生。

我不喜欢做翻译

从我17岁公开发表第一首翻译作品算起，译龄已有60多年了。但最初，我并不愿意从事翻译工作。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东北长大的。面对当时的现实，特别是看到奴相十足的“翻译官”，十分厌恶。我觉得翻译是给别人服务，替统治者

做事。

我当时译的是屠格涅夫晚年写的《曾是多么鲜多么美的一些玫瑰》，这首诗的名字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因为它给你带来很多幻想。读这首诗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朦胧的希望仿佛在呼唤着自己，感觉挺神秘的。

那个时候，哈尔滨是伪满洲国的一座城市，生活太黑暗了，要想去北京，还得办出国护照。我活得很消沉，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也没有革命意识。

1945年8月15日哈尔滨光复，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我在友协的报社工作，常常翻译些俄苏的诗歌散文，当时用过至少有七、八个笔名，其中一个名字是“何焉”，我是在反问自己：“我不喜欢做翻译，为什么还在做？”1949年初有一天，路过哈尔滨的戈宝权同志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研究者见见面。那时候，他很有名气，是研究苏联文学的头面人物。

我跟戈宝权说了我不想做翻译的想法。他说那要看是给谁做翻译，翻译的是什么作品。我立刻领悟了，从此，我决心要为人民做翻译，并起笔名“乌兰汗”，即做“红色的人”的意思。

高先生受的教育不多，才会有“全国都说东北话”的笑话。现在回想当年的轶事，除了感慨当时信息不畅，更需要注意的是那一代翻译家的起点和生存环境。

全国都说东北话

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时候，读到俄文版《保尔·柯察金》。这是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它对我的震撼太强烈了。你们没法想象我当时的感动。而且，对比之下，更为自己感到惭愧，所以我把它翻译了出来。

1947年，这部话剧被教师联合会剧团选中公演，其中冬妮娅的扮演者就是我现在妻子孙杰。那时大家都不了解苏联的情况，甚至人物的衣着打扮也都想象不出来。孙杰常常找我了解剧本里的一些问题……

当时尽管演出条件差，但演出场场爆满。解放初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这部戏，用的是我翻译的那个剧本，导演是从苏联回国的孙维世，演员中有大名鼎鼎的金山、张瑞芳等人。剧本里有一些台词是东北话，青艺演出时作了改动，我是在哈尔滨土生土长的，没去过其他地方，以为全国人民说的都是我们那种语言呢。

“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

阿赫玛托娃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女诗人，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现在回头看看往事，除了荒谬，还需要一点警惕。

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让我重新认识了苏联诗歌。多少年后，我在一首诗中写过阿赫玛托娃是“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妻子中最不幸的妻子”，“背负着沉重的黑色十字，跋涉于凄风苦雨的人世，寒霜打僵了她的心，烈火烧尽了她的诗，她变成了影子，影子也得消逝……”1946年，苏联公布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为此作了专门的报告，大肆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那时，我们非常重视苏共的文件。这样一个有关文艺的决议和报告当然要翻译出来，供我国文艺界学习。我译了初稿。翻译这个决议的时候，我并没有读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

这个决议和报告把阿赫玛托娃骂得一塌糊涂，说她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等等。我不但翻译了而且还接受了决议的观点。1954年，我随着我国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参加他们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和阿赫玛托娃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如果当时见到她，我一定会以决议和报告的精神来看待她……所幸，我们没有见过面。现在我常常想，那个时候脑子怎么那么简单？

文革后，我想了解阿赫玛托娃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要被骂作“荡妇”。在北京图书馆借到西方出版的她的原著，书上还打着“内部参考”的图章。一看才

发现，她的诗歌毫无荡妇的影子！特别是读了她的长诗《安魂曲》之后，更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诗人。我翻译了一些她的作品，越来越喜欢。

我觉得我愧对阿赫玛托娃。当年我毕竟翻译过联共（布）不切实际的决议和报告，而且还让好多人都相信了那种极左的看法。后来我专程去过她和左琴科的墓，凭吊这两位作家，也写过文章悼念他们。

“怎么批怎么合适”

高莽经常为著名文学家作画像，这些肖像往往是形神兼似的。有时候不免令人觉得高莽其实更应该是一位画家。

解放初期，文艺界挨批的，我大概是第一人，只不过我是“小萝卜头”，不为大家所注意，而且在我之后文艺界又出现了几个“反党集团”大案。

1948年，哈尔滨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展了反浪费运动。哈尔滨团市委《学习报》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我画了7幅反浪费的漫画，刊出了4幅。后来，约我作画的编辑传达上级指示，要我检讨，说有人提出批评，指责我丑化劳动人民，是立场问题，对读者有害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不知道是谁又把这4幅漫画寄给了创刊不久的《文艺报》，说画有问题。《文艺报》编辑部邀请了在京从事漫画和文艺评论工作的部分同志，讨论分析了我的漫画，然后委托华君武和蔡若虹两位美术界领导同志写批判文章。

华君武在文章中对我充满了关切，文章结尾提醒漫画作者说，一方面要努力学习政治、坚持真理，一方面不要怕犯错误而搁笔。但我怕犯错误，搁了笔，决心再也不用漫画进行讽刺了，夹着尾巴做人吧。从此，我走上另一条路：只赞美，只歌颂。当时东北开展向苏联学习的运动，我画了一本表现火车司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连环画，出版后我送给华君武同志，以为他会表扬我，没想到他说：“你画的不是连环画，是给鉴定做的插图。”“反浪

费漫画事件”之后，每次政治运动都要为此事进行检讨。因为我长在敌伪统治的环境里，在教会学校念书，家里又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怎么批怎么合适的那种人。

华君武后来写文章回忆那段历史时说，批别人容易，批自己难。有一次我碰到他，他说：“当年我批你，可能扼杀了一个漫画家。”我说：“多亏你批了我，也许挽救了一条命。”因为我了解自己的性格，说话没遮拦，如果没有那段经历，以后的政治运动我不知道会犯什么错误。而且我意志薄弱，如果是突然遭遇到那些猛烈的政治运动，说不定就自绝于人民了。

不一样的翻译理念

50年代茅盾先生主持《世界文学》杂

高莽对翻译的理解无疑是超前的，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理解，《世界文学》为读者带来了更多、更新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

志时，我作为翻译陪他会见过苏联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那个人相当于我国的作协主席。茅盾告诉他说我们要发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个人说：“这部作品宣扬个人主义，对青年有毒害，还是不要发表为好。”茅盾表示和他的看法不同。

《世界文学》发表了《老人与海》，几年之后，苏联思想界摆脱了禁锢，也发了这部作品。我当时就想，虽然我们好多东西都学习苏联，总说“苏联是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我们不一定全都不如人家，比如对《老人与海》的看法，茅盾就比他们看得远看得深。

我在《世界文学》工作期间，也尽量介绍外国新的流派，有代表性的新作品。

我翻译了一些作品。有的老翻译家劝我翻译经典的作品，但我不太愿意翻译前人已经翻译过的。第一位优秀译者费的苦心是不容轻视的，而现在有股不正的风气，有的人找出四五个前人的译本，综合

一下，就成了自己的作品。

我也不愿意翻译历史已经定位成大作家的作品。我老想跟着时代走，在那些作家没有得到定论的时候，测验我自己的欣赏水平和观察能力，判断这个人有无前途，能否成为大作家，然后把他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

我没能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什么经验，虽然字数在那摆着，年龄在那摆着，但有什么用呐？不过，像我这样既做翻译又画画，自己还进行创作，并且能得到读者和观众认可，也算是幸运了。

记者手记

“我这个人随着命运走，命运让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先生用极浓的东北腔对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东北人说起话来仿佛格外诚恳和发自肺腑，透着一股豪爽劲儿。而那些他们所独有的方言词汇更具有普通话难以言表的趣味和魅力。

但是，东北方言却一度成了先生做翻译时的障碍。年轻时的他从未离开过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伪满洲国，以为全国人民都是这么说话，翻译出来的作品也充满了东北俚语，直到一位女作家提醒他语言不纯。

有趣的是，谈话期间，先生不断地与我商量：“我做翻译真的没什么好谈的。我想，要不我们谈谈我画的画吧，那更有意思一些。”说着，就起身拿出许多画作出来给我看。

我说：“我发现您对绘画的兴趣要高于翻译啊？”先生马上点头说：

“是的，是的！是命运让我做了翻译家。”

A photograph of a grand, ornate hallway with high ceilings and classical architecture. In the foreground on the right, a sign on a black pole reads "DO NOT CLOSE MINDS TO NEW POSSIBILITIES WHILE ON PREMISES". In the background, several people in business attire are walking away from the camera down the hallway. The lighting is warm and comes from chandeliers hanging from the ceiling.

DO NOT
CLOSE MINDS
TO NEW
POSSIBILITIES
WHILE ON
PREMISES

“南思”译于希腊文“NOUS”，“NOUS”在希腊哲学中基本含义为心灵，引申为理性，沟通从心灵开始，理性是人类的向导与光辉。南思翻译的企业理念正是构建在此基础上，秉承“Knowledge & Reason”（“知识与理性”）的企业哲学，凭借在语言文化领域的深厚积累，南思人愿以自己的努力实现世界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看世界的终极目标。

选择南思，选择沟通的无限可能

心灵成就沟通

南思翻译（北京）有限公司

26部诺奖作品翻译者竟一样 克隆加修改，怀疑是抄袭

当今，读者所见的不同语种的外国文学作品一般都是由不同译者翻译的。但日前记者却获悉，时代文艺出版社10月推出的一套诺贝尔文学奖文集，却是由同一位译者领衔翻译的，这位译者如何做到了这一点？这可能吗？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缘起选书

一套书26部 译者都一样

最早发现这套涉嫌抄袭的图书的是南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的陈远焕。

最近，他在选书时发现了一套“特殊”的图书，“这套书标价600元，名为‘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是时代文艺出版社10月份刚刚出版的。它的排印与外表装帧均不错，体例也符合规范。但在翻阅时我发现全书26部，在译者署名上，竟然是一样的——都署成‘李斯等译’。当时我就觉得不可思议，这种署名法实在少见，不管翻译的人名气大小，出版时都应该按规矩据实署名，做成这样，很不规范很不严肃。”

陈先生所说的这一点，记者随即得到证实。记者在卓越网和当当网，均找到了这套书。而书封面上26部确实都是同样地写着“李斯等译”。而且记者注意到，这套文集涉及12个国家的语言，比如蒙森写的《罗马史》是德文版，普吕多姆的《普吕多姆诗选》是英文版，法朗士的《诸神渴了》是法文版，确实不可能依靠李斯这一位译者，就完成这26部书的翻译。

此外，陈先生还指出，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都是一个人，26本严肃文学作品只有一个责任编辑，如何保证文字的质量？

稍作比较

克隆加修改 怀疑是抄袭

陈远焕翻开书时，感觉书中行文似曾相识。他将时代文艺出版社这套书其中几本与馆内的几套诺奖作品比较后得出结论：这套书可能是根据国内已有的版本稍加改换，靠抄袭推出的新书。

他举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第八章中，开篇是这样几句：“战争和战争的呐喊，驻扎军队和纷扰忙乱！普鲁士军官在布登勃洛克议院新居二楼的拼花地板上踏来践去，吻女主人的手，克利斯蒂安（这时他已经从鄂文医院回来了）带着他们到俱乐部去。”在时代文艺出版社的这一段是这样写的：“战争和战争的呐喊，驻扎军队和纷扰忙乱！普鲁士军官在布登勃鲁克议院新居二楼的拼花地板上踏来践去，吻女主人的手，克利斯蒂安（这时他已经从鄂文医院回来了）带着他们到俱乐部去。”还有的字句稍加改动，如把“城里”改成“城中”，“一八六五年”改成“1865年”，有的还改错了。

陈远焕说：“稍下点功夫便能发现以上问题，真不明白责任编辑在如何尽自己的责任？”“如此翻译、编辑、出版，就是在糊弄图书市场、坑害读者。”

记者调查

出版社图省钱 翻译者有“前科”

记者随即与这套书的责任编辑取得了联系。

对“诺贝尔文学奖文集”，该编辑介绍说，这是出版社运作了四年的一套书，为节省版权费用，这26部书里涉及到的作家，都已过了版权保护期了。

针对译者署名的问题，他解释说：“李斯很有名气，以前译过《垮掉的一代》。这套书的翻译，除了李斯，还有他开的一家翻译公司的其他成员。署名时，我们想借助李斯的名气，就没有署其他译者的名字。”

针对记者提出的翻译内容与已出版的图书存在雷同时，该书责任编辑表示对这个问题自己不好过多解释，“我们按千字50元的价格付给了李斯翻译费用。”但他提出，不同的译者面对同样的原文，译文可能没有太多的出入。

当记者询问李斯联系电话时，这位责任编辑告诉记者，他现在也在找李斯，但一直没联系上。记者随后在搜寻“李斯”资料时，却发现“垮掉一代”研究专家文楚安的评论：“（李斯编著的《垮掉的一代》）居然将‘翻译’冒充‘著作’出版，而这翻译又实在太不高明……全书几乎原文抄袭美国学者约翰·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业内观点

不同译者翻译 结果肯定不同

就该书责任编辑“不同译者翻译同一段文字，译文很可能没有太多的出入”的观点，记者采访了几位翻译界业内人士。

张福生先生是位资深编辑，从1977年以来一直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他认为，不同的翻译者有不同的风格，在用词、句式等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甚至一句话，先翻译后面还是先翻译前面，大家的选择都不同”。针对记者提出的“诺奖”书中出现成段的几乎一致的翻译文章，他认为抄袭的可能性很大。

《世界文学》杂志前总编高莽先生，在听完记者念的两段文字后，也认为这套书抄袭的可能性很大。“一些难的句子，根本不可能出现几个人翻译结果一样的情况，即使是简单的句子，也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同业揭露

抄袭出书不新鲜 出版方必有暴利

张福生还表示，这种事情在业内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很多书商都这么做，只不过读者不知道罢了。“有的作者甚至连外语都不懂，就号称翻译什么西

班牙语、德语的书，其实他就是搜集几套正规出版社翻译的东西，然后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改改标点，把自然段或者合并或者分散，这样最后就成了一本新书，其实就是无耻抄袭。”

高莽也举例说，以前他翻译过一篇文章，叫《人和事》。“‘事’这个翻译结果，完全是我个人的创造，按原文不可能在字典里查到这种解释。而后来，别人在翻译时，我发现也用了这个标题，这就是抄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图书业内人士还表示，这套26本的图书定价是600元，相比投入，绝对是暴利。“正规出版社因为讲究流程、纸张，出版成本要高一些。按我的估计，书商这套书的制作成本不会高于25%。也就是说，做这套书的成本不会超过150元，因为不需要付版税，也不需要付翻译费用，甚至可能也不用什么好纸张。”

后续反应

涉嫌被抄出版社 将开始搜集证据

记者采访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在翻阅了相关文字的复印件后，答复记者说，对这种行为，他们将采取必要的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不排除与其他权益被侵害的出版社联名起诉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在多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打赢过这样一起官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市场部有关人员也表示，将密切关注这件事情，会把相关图书进行比较，搜集证据。

有业内人士表示，通过打官司虽然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国家有关法律应该对这种行为严惩，否则对方只是轻描淡写地受到一些处罚，损失不大，会依旧继续做下去。

北京娱乐信报记者 赵明宇

译意风



译者无疆

沟通无限



专业语言服务提供商
南思翻译（北京）有限公司

感谢您的关注！



南思翻譯（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66号院
远洋新干线A座11层

邮编：100027

电话：8610-84467461, 84467462

传真：8610-51282246

电邮：nousservice@163.com

网站：www.nousintl.com